

花开叶落中文系

陈平原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2267
201486

P1

陈平原
著

花开叶落中文系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hinese Copyright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开叶落中文系 / 陈平原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11
ISBN 978-7-108-04553-9

I. ①花…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4066号

责任编辑 卫 纯
封扉设计 蔡立国
封面摄影 李浴洋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网 址 www.sdxjpc.com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1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23.5
字 数 304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41.00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序 言

刚刚过去的这五年，忙忙碌碌的我，出版了大大小小 15 本书。表面上“战绩辉煌”，可实际上，有的是文章结集，有的是旧作修订，有的是游记随笔，真正的专著只有《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香港：三联书店，2008）和《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即便这两种著作，也是多年经营的结果，大半章节成于此前。并非偷懒，也不是才华枯竭，而是精力过于分散，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学问之所以做到如此“汗漫无所归依”，与我这几年的生活状态密切相关。

2008 年 1 月，我应聘出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讲座教授。椅子还没坐暖，北大要求我回来接任中文系主任。两校协商的结果，我成了双聘教授。两边的工作都很重要，两边的工作都必须做好，于是，只好南北奔波。中大那半年相对好些，以教学及研究为主，平日里与北大保持密切联系，偶尔应召回京；北大这半年则杂事繁多，既然长不出三头六臂，只好放弃长篇论文的写作。灵机一动，学会了见缝插针，将开场白、演讲稿、书刊序跋等，全都作为“文章”来经营。

比起个人撰述来，北大中文系主任的责任无疑更为重大。四年任期，还算用心用力，未见明显缺失。刚上任时，我的表态是“努力阻挡北大中文系下滑的趋势”；现在看来，这目标基本上实现了。我当然明白，“在其位”就得努力“谋其

事”；可在具体操作时，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最主要的，并非时间紧迫耽误写作，也不是人事纠纷尔虞我诈，而是自家的学术理念与当下的学术制度不吻合，时有言不由衷的痛苦。这厢刚撰文批评，那边又开会提倡，左手右手互相掐架，实在做不到“理直气壮”。既怕自家的特立独行影响北大中文系的整体形象及利益诉求，又不能全心全意贯彻学校及教育部的指令，如此左右支绌，着实有点心力交瘁。

我的“就职演说”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们必须适应这个变化了的世界，但不一定非‘随风起舞’不可，中文系应努力营造一种氛围，让老师们保持平和的心态，从容地读书、教书、写书。当然，单说‘支持’而不讲‘责任’，那也不公平；对于很多学者来说，确实需要某种外在的‘压力’。但我希望这种‘压力’不是具体的论文指标，而是一种‘氛围’，以及无言的督促。现在都主张‘奖励学术’，可如果缺乏合适的评价标准，奖励不当，反而徒增许多矛盾。我希望通过逐步摸索，建立一套相对合理的考核与评价体系。”在一个热情但又浮躁的时代，靠营造氛围来推动学术，说来容易，真要落实，很难。创办《北大中文学刊》、《中国文学学报》（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设立“胡适人文讲座”、“鲁迅人文讲座”，组织“博雅清谈”，完善各种规章制度等，都是指向这一目标。这些举措，有一定的效果，但整个大环境如此，实在无法“力挽狂澜”。这一点，在卸任前所作“述职报告”中，我有清醒的分析。

四年任期一到，我坚决要求卸任；对此，很多人不以为然。有认定我想远走高飞的，有替我打抱不平的，还有人惋惜我没能“更上一层楼”。去年秋天接受《环球人物》记者专访（参见《陈平原，不凑热闹，不怕出局》，《环球人物》2012年30期），有一段对话发表时被删去。记者问：“作为北

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您的言行比其他人更受到外界的关注。这种身份，或者说这种关注对您来说，是一种可以借以‘发声’的力量，还是一种负担、约束？”我的回答是：“虽然自我介绍时，总强调自己是‘北大教授’；但我还是隐约感觉到，‘北大中文系系主任’这个头衔，能增加说话的分量。问题在于，这年头各领域都闹‘通货膨胀’，任何一所中国大学，校长、书记、副校长、副书记、校长助理一大堆，还有院长、部长什么的，最后才轮到你系主任，有什么好夸耀的？倘若在政界、商界，‘系主任’这头衔太小了；要说在学界，我是不是‘系主任’，其实关系不大。更何况，我实在缺乏行政兴致与官场智慧——不止一位朋友提醒，我的公文、讲稿及给领导的信，都太个人化了，不合时宜。去年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我谈及：‘当了北大中文系主任，有些话不太方便说，让我很苦恼。作为一个教授，我对教育部的决策、对北京大学的现状，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现在，有些话只能绕着弯子或换另一种方式说。过多考虑讲话的策略与效果，这不是我的风格。可当下中国，很多人把人情与学问混为一谈，我不能把个人趣味凌驾于院系前途之上。’这样的苦恼，别人觉得很好笑。好在今年9月起，我卸任了，以后就以‘教授’的身份说话，那样更本色些。至于‘力量’是不是因此而减小，我不知道，也管不了。”

说自己“缺乏行政兴致与官场智慧”，并非标榜清高，而是真诚的自我反省。因为，不管你官大官小，只要做行政，就必须讲究合作、折中与权谋。不耐烦无聊的琐事，不习惯跟各种类型的人打交道，不愿意受委屈，不能掩饰自己的不满乃至不屑，这样的人做行政，一定很痛苦，而且效果不好——起码在中国是如此。作为学者，你可以表里如一，可以无欲则刚，甚至千里走单骑；可若是当行政主管（不管级

别高低)，你这么做，对所在单位没有好结果。

不断有饱经沧桑的朋友善意提醒，我看世界“太天真”，说话时“过于直截了当”，考虑问题又“不计工本”。这样的行事风格，在今日中国大学，显得不合时宜。想想我对某些领导或潮流的不满、不屑以及不配合、不转弯，即便没说出来，也都写在脸上，自然不适合做行政工作。可话说回来，若不当系主任，我有必要把人际关系想得那么透彻、把话说得那么委婉吗？整天瞻前顾后，捉摸领导意图或风气变化，必定患得患失，那是做不好学问的。本就不是天纵之才，加上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紧赶慢赶才走到今天这一步，不想再委屈自己了。那篇《我们和我们的时代》，大概只有同代人感同身受，读出其中的苦涩与无奈。我们这代人，原本志存高远，经历那么多曲折与苦难，学问上、精神上到底还能走多远，如何突破各种外在以及内在的限制，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别的不说，过多的世俗羁绊，导致我们的思考与表达都不够果敢与决绝，连“独善其身”都显得勉为其难。

既然“事功”不可为，那就凝神静气做学问，这基本上还是可以自己把握的。除了上课，今年我的主要任务是收拾心情，调整气息，进入较好的学术状态。在此之前，编一册小书，收录近五年间有关“中文教育”的评论、随笔与杂感。长文不在其中，因已进入或即将进入专业著作；短文中涉及“大学”、“五四”或“都市”等话题的，也都另行安置。本书的宗旨是，借助一个有过短暂行政经验的中文系教授的目光，来烛照或凸显当前文学教育及行政管理的若干问题。

本书所收均为旧文，仅起“立此存照”的作用；至于这五年间个人的得失成败、酸甜苦辣，日后专门追忆与辨析。这里需要略加解说的是：两篇在中文系教师会上的讲话，此前未曾公开发表；《毕业典礼如何致辞》乃长篇论文的一节，

为因应时事而提前刊发；十多则这段时间所撰的发刊词、编后记、丛书总序等，虽与中文系及文学教育密切相关，因很容易说开去，故暂时搁置。

此时此刻，编纂这册小书，除了自家心境，还有一个特殊因缘——北大中文系即将从静园五院迁往未名湖畔的人文学苑。明知“何处春江无月明”，告别那春天里瀑布般倾泻而下让人心旌摇动的紫藤花，以及秋阳下层层叠叠如火焰燃烧的爬山虎，还是有点感伤。

花开叶落，本是大自然的规律，只是相处时久，依恋日深，不免也都有些“伤春悲秋”。作为一个百年老店，北大中文系并非第一回迁址；每次转移，都伴随着几多风雨。于是乎，我辈匆匆过客，乃借追怀“往事如烟”，鉴赏“师友风流”，勾勒“另类系史”，以体现自家的“中文情怀”。

2013年2月7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目 录

001 序 言

另类系史

003 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

006 “中文教育”之百年沧桑

018 百年阳光，百年风雨

024 《北大中文百年庆典纪念册》后记

028 回首烟波浩渺处

046 《鲤鱼洲纪事》出版感言

048 想我筒子楼的兄弟姐妹们

054 “非典型”的筒子楼故事

060 传道授业的责任与魅力

067 语言学家的文学事业

071 《中国文学：古代与现代》编后

074 寻找“系友”张充和的故事

080 告别一个学术时代

083 为何“严”上还要加“严”

087 诗人气质的学者

090 课堂的魅力

093 与当代中国诗歌同行

中文情怀

099 北大中文系主任就职演说

105 北大中文系主任述职报告

113 “讲座”为何是“胡适”

120 “薪火”何以能“相传”

123 诗歌乃大学之精魂

125 未名湖的梦想

127 同代人的学问与心情

130 “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

137 毕业典礼上的“赠言”

139 知书、知耻与知足

145 中文人的视野、责任与情怀

149 图书馆的学术使命

154 感恩与遗憾

往事如烟

161 学生记忆中的“讲学”

166 “爱书成癖”乃书生本色

170 燕山柳色太凄迷

179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

195 孤独的寻梦人

199 三读普实克

203 问世间，“学”为何物

206 在学术与思想之间

221 格外“讲礼”的吴宏聪老师

226 追怀米列娜

230 师长们的故事

师友风流

237 宗璞的“过去式”

- 240 教授生活，可以如此优雅
- 250 诗人的美食
- 254 把人生当作一首诗
- 257 你读莫言了吗？
- 260 “在场”的意义
- 263 有师自远方来
- 267 有学问，又好玩
- 270 治学是一种“乐趣”
- 273 人生路上，不断与“五四”对话
- 277 那些失落在康乐园的记忆
- 294 我们和我们的时代

文章杂说

- 301 看奥运，更看“看奥运之人”
- 303 学会怀疑自己
- 306 同一个中国……
- 312 俗文学研究视野里的“潮州”
- 320 人，如何“诗意地栖居”
- 323 为何“文库”，什么“文学”，哪个“海上”
- 329 民族自信与文艺复兴
- 333 毕业典礼如何致辞
- 338 人为什么远行、登顶且赋诗
- 348 作为大学精魂的诗歌
- 352 如何“述学”，什么“文体”
- 362 不薄小说爱诗文

另类系史

随着时光流逝，前辈们渐行渐远，尤其是本世纪初期文学不在，散文领域外，如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不满与彷徨，似乎并未阻止过他们“另类”的文学追求，他们对于文学与政治、社会没有距离，反而更趋于清晰。

为什么于连这样的青年，便对东渡、欧洲文学与思潮，大加推崇，而下雨的，才是“几个半”，今日读起来却有些荒唐，20年后，30年后，100年后，是否仍能激起文学的涟漪，或者像《你与你的过去》中，毒害了你我与历史，或者又一一重演，限制了你我与历史。借用鲁迅的话：“伟大的艺术有人做”，就像今天文学纷纷诉说国家、民族情，20年后，不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是残酷的裁判，不管多好的小说，总会有衰落的时候，那时，什么是“生命之真”，何谓文学史上真正的“关键时刻”，方才一目了然。

当然，改革有个前提，那就是对于某些曾陪伴过若干世纪的先行者，后人必须有足够的敬意与同情，15年前，我写《文学与文学的过去》，谈及“中国每个文人都被规定‘传统’，学者自然也不例外，在最初一本教科书出现的同时，遭遇质疑与不信任的学者，更是一种幸运”。所谓“打破”，除了打破传统观念，更有打破学术的壁垒。在我看来，与第一流学者——也就是有强烈现代意识者“对话”，在一种高度自觉与自觉的“对话”中，产生出，从陈独秀到胡适再到胡风等，老路上与新路“对话”，就使其有真正的现代意识与精神的提升。

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

随着时光流逝，前辈们渐行渐远，其足迹本该日渐模糊才是；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有心人的不断追忆与阐释，加上学术史眼光的烛照，那些上下求索、坚定前行的身影与足迹，不但没有泯灭，反而变得日渐清晰。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距离太近，难辨清浊与高低；大风扬尘，剩下来的，方才是“真金子”。今日活跃在舞台中心的，20年后、50年后、100年后，是否还能常被学界记忆，很难说。作为读者，或许眼前浮云太厚，遮蔽了你我的视线；或许观察角度不对，限制了你我的眼光。借用鲁迅的话，“伟大也要有人懂”。就像今天学界纷纷传诵王国维、陈寅恪，20年前可不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是最好的裁判，不管多厚的油彩，总会有剥落的时候；那时，什么是“生命之真”，何者为学术史上的“关键时刻”，方才一目了然。

当然，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对于那些曾经作出若干贡献的先行者，后人须保有足够的敬意与同情。15年前，我写《与学者结缘》，提及“并非每个文人都经得起‘阅读’，学者自然也不例外。在觅到一本绝妙好书的同时，遭遇值得再三品味的学者，实在是一种幸运”。所谓“结缘”，除了讨论学理是非，更希望兼及人格魅力。在我看来，与第一流学者——尤其是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结缘”，是一种提高自己趣味与境界的“捷径”。举例来说，从事现代文学或现代思想研究的，多愿意与鲁迅“结缘”，就因其有助于心灵的净化与精神的提升。

对于学生来说，与第一流学者的“结缘”是在课堂。他们直接面对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课程表”，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20世纪中国的“大历史”、此时此地的“小环境”，讲授者个人的学识与才情，与作为听众的学生们共同酿造了诸多充满灵气、变化莫测、让后世读者追怀不已的“文学课堂”。

如此说来，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没有录音录像设备，所谓北大课堂上黄侃如何狂放，黄节怎么深沉，还有鲁迅的借题发挥等，所有这些，都只能借助当事人或旁观者的“言说”。即便穷尽所有存世史料，也无法完整地“重建现场”；但搜集、稽考并解读这些零星史料，还是有助于我们“进入历史”。

时人谈论大学，喜欢引梅贻琦半个多世纪前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何为大师，除了学问渊深，还有人格魅力。记得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有这么一句话：“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其实，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走出校门，让你获益无穷、一辈子无法忘怀的，不是具体的专业知识，而是教授们的言谈举止，即所谓“先生的音容笑貌”是也。在我看来，那些课堂内外的朗朗笑声，那些师生间真诚的精神对话，才是最要紧的。

除了井然有序、正襟危坐的“学术史”，那些隽永的学人“侧影”与学界“闲话”，同样值得珍惜。前者见其学养，后者显出精神，长短厚薄间，互相呼应，方能显示百年老系的“英雄本色”。老北大的中国文学门（系），有灿若繁星的名教授，若姚永朴、黄节、鲁迅、刘师培、吴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刘文典、杨振声、胡适、刘半农、废名、孙楷第、罗常培、俞平伯、罗庸、唐兰、沈从文等（按生年排列，下同），这回就不说了，因其业绩广为人知；需要表彰的，是1952年院系

调整后，长期执教于北大中文系的诸多先生。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奠定了今日北大中文系的根基。

有鉴于此，我们将推出“北大中文文库”，选择20位已去世的北大中文系名教授（游国恩、杨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骅、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林庚、高名凯、季镇淮、王瑶、周祖谟、阴法鲁、朱德熙、林焘、陈贻焮、徐通锵、金开诚、褚斌杰），为其编纂适合于大学生/研究生阅读的“文选”，让其与年青一辈展开持久且深入的“对话”。此外，还将刊行《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学友》、《我们的五院》、《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园地》、《我们的诗文》等散文随笔集，献给北大中文系百年庆典。也就是说，除了著述，还有课堂；除了教授，还有学生；除了学问，还有心情；除了大师之登高一呼，还有同事之配合默契；除了风和日丽时之引吭高歌，还有风雨如晦时的相濡以沫——这才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怀的“大学生活”。

没错，学问乃天下之公器，可有了“师承”，有了“同窗之谊”，阅读传世佳作，以及这些书籍背后透露出来的或灿烂或惨淡的人生，则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正因此，长久凝视着百年间那些歪歪斜斜、时深时浅，但却永远向前的前辈们的足迹，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作为弟子、作为后学、作为读者，有机会与曾在北大中文系传道授业解惑的诸多先贤们“结缘”，实在幸福。

2010年3月5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初刊《人民日报》2010年4月22日，后作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刊行的“北大中文文库”及“北大中文百年纪念”丛书的“总序”，收入各书）

“中文教育”之百年沧桑

每一个中国人，自打牙牙学语起，就在进行卓有成效的“中文教育”；但作为现代大学制度下特定的科系与课程，系统的“中文教育”（隶属于现代大学里的“中国文学门”、“中国文学系”、“中国语文系”、“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却只有百年历史。这里借北大中文系走过的坎坷历程，观察百年教育之风云激荡。

一、从书院教育到大学制度的建立

传统中国的书院教育，跟今天我们实行的大学制度，无疑有很大的差异。站在中文系的立场来观察，首先，以前的书院教育，不管哪家哪派、何时何处，都是以人文学为中心的。到了晚清，随着西学东渐，现代大学制度建立，“中文”或“文学”逐渐蜕变成众多科系中的一个。

曾经的“不学《诗》，无以言”，成为遥远的神话；“文学”就这样被“边缘化”为一个特定的专业了。当然，古时学《诗》，不等于今天念“文学”，几乎涵盖了整个人文学以及人格修养等。在传统中国，“文学”是所有读书人的基本修养，而不是一个“专业”。除了在特定时空，如东汉末年的“鸿都门学”，南朝宋文帝的“四馆”，有过相当短暂的专门的文学教育外，其他时候，今天所理解的“文学”，是所有中国读书人的“必修课”。

其实，不仅仅在中国，整个世界都如此，18世纪以前的大学课程，都是以人文学为主导。直到19世纪，随着科技突飞猛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继崛起，人文学科才逐渐从中心向边